

鲁迅：在墨迹中永生

□李继凯

近期,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讲话中列举了高等教育的四大功能,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功能之外,还特别强调了高校要发挥其“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作为中国特色文化的书法文化,必将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有所作为。即如鲁迅当年为北京大学用书法设计且沿用至今的校徽,以及许多集“鲁字”为校名、院名、刊名、报名、馆名等文化行为,还有更为丰富和精彩的鲁迅书法实践(包括条幅横幅对联题字及大量手稿手札等),以鲁迅诗文或以书写鲁迅的诗文为内容的大量书法作品等等,作为文化的创造尤其是精神文化的创化,业已构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鲁迅文化现象”,既与校园文化有关,也与社会文化有关,于是演化为“文化传承创新”的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其实,“文化传承创新”不仅是高等学校的重大使命,也是文学艺术家理应承担的重大使命。作为一位杰出的中国文人作家,鲁迅即能够通过其书法书写(包括具有文学创作与书法书写等复合特征的“第三种文本”的书写)为我国“文化传承创新”提供重要的资源和启示。鲁迅由此也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生命存在方式,甚至意味着,在其不朽的书法墨迹中,他也将由此获得永生。可以说,鲁迅用廉价的“金不换”书写的大量墨迹,包括作为国家级文物珍藏的真迹和借助各种媒体传播的书法影迹,显示出了永久传世的强大生命力,可能较之于许多所谓“专业”书法家的作品,还要具有不朽的文化价值和隽永的艺术魅力。古人追求“立德立功立言”,并称“此之谓三不朽”。伴随着时代文化语境的转换,鲁迅的人生实践及追求亦可谓存有“三不朽”,即“立人立国立象”。关于他的“立人”“立国”之说,论者甚多,但关于鲁迅的“立象”,却论述不多。这在当

今“读图”时代,似乎应该努力加以改进。值得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象”,即为墨迹、墨象,是“书法意象”,是作家型书法家将其情思哲思感悟想象融于墨象的结晶。于是用生命创化且灌注人文气息的“立象”亦可不朽。倘将鲁迅书法及相关书法精选并镌刻于石,设立西安碑林式的“鲁迅碑林”,那蔚为大观的墨迹气象,也定然会成为人间罕见的名胜。

鲁迅曾经希望自己的杂文速朽,但却从没有说过希望自己的书法速朽。他还曾经将认真创作的书法作品送给朋友,包括许多日本朋友。甚至由此体现出了从“拿来主义”进至“送去主义”的文化追求。诚然,日本对鲁迅的人生和精神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他在传统文化修养方面却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了某种自信,特别是在书法文化方面。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他非常热爱收藏碑帖画作,却很少收藏日本现代书法方面的东西,包括日本书法家的作品,相反,他倒经常挥毫创作书法作品送给日本友人。由此看来,他不仅是力主“拿来主义”的先驱,而且也是“送去主义”的现代先锋,在书法方面尤其如此。这无疑出于他的一种文化自信,包括在书法造诣方面的自信。自然,作为一种国人殷切期盼的文化创造境界,从“拿来主义”走向“送去主义”,这在整体上需要一个持久的艰难而又曲折的奋斗过程。可以说,20世纪的鲁迅与21世纪的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民族文化复兴之梦。这也启示我们应尽快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道路,在文化创造的追求方面,永不满足,既谦虚“拿来”,又自信“送去”,为母国和东方的文化复兴或崛起,奉献一份才智和心力,就像当年鲁迅所曾做过的那样。

鲁迅书法是我深心喜爱的文人书法大家之

经典作家

一。在寒斋中虽无鲁迅书法真迹,但在有关鲁迅的数百册书籍及诸多藏品中,也常可见到鲁迅的墨迹。有从北京鲁迅博物馆购买的鲁迅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有从多地购买的《鲁迅诗稿》《鲁迅名篇手迹》《鲁迅手迹珍品展图录》等等,时或观赏欣赏,每每欣然陶然,废寝忘食。面对鲁迅一生留下的大量的墨迹存稿,能够静心体味甚至心摹手追,可说是一种难得的人生幸福。半个多世纪前,郭沫若曾挥毫为《鲁迅诗稿》(影印本)撰写了序言,由此也成就了一篇名文和名帖,其中经常被后人引用的则是这样的名论:“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这段话道出了郭沫若观赏鲁迅诗稿书法的艺术感受,鉴于郭氏对书法的用心用力 and 潜心研究所达到的大家境界,人们普遍相信他对鲁迅书法的推崇是有一定道理的。其谓鲁迅“所遗手迹,自成风格”,稍谙书法者,大多都会认为确乎如此,同时见字如面,看到鲁迅墨迹,还会油然而生一种音容宛在的感觉。

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保存和爱护鲁迅的书法墨迹,除了采取文物保护的珍藏方式之外,还可以制作为纸质的、镜像的以及电子的各类形态,使之永远传播下去。而鲁迅书法与新媒体的紧密结合,则呈现出一种可喜的传播态势。比如网络上不仅有了鲁迅书法的大量图片(某些图片似还经过了精心加工),还可以查询很多相关的文献或论文,即使在网民的某些片言只语中,也往往可以领略到走下神坛、走向民间的鲁迅所拥有的文化魅力。有网民如是说:“鲁迅不是俗人,其文是丰碑,其字是高山。钢笔铅笔,毫毫狼毫,只能说明笔的用料,而就笔之用途来说,则分文笔与书笔,或用于作文,或用于书法绘画。那么妙笔生花,则是用笔的最高境界。”网络世界无疑可以将鲁迅墨迹传播到全世界,将鲁迅生花妙笔所创造的书法之美、持续传扬开去,影响一代又一代喜欢中国文化的人们。

(作者系陕西师大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在章太炎的影子

□孙郁

早期的鲁迅看重章太炎,其实是相信英雄人物的济世能量的。即觉得救民于苦海的,大抵是有学识、见解深的人,是可以冲向火海的斗士。那时候他崇尚拜伦、海涅,对摩罗诗人有感情,都是这样。他将此喻为知识阶级的战士。而那时候在中国能担起这个称号的,只有章太炎等少数人。

《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都是斗士的宣言体。这固然受到尼采的影响,但在东方人思维上来说,内含着章太炎《儒书》里的激情,连一些词语也和老师接近。太炎在思想上和文体上,都对其有感化作用。

太炎的文章有气象,是朗照的,周身光泽。与明清文人的萎顿文体一比,立见高下。学问与人格都有迷人的色彩时,文字也非同寻常的美。现代史上,他是个文体家,不过这样的文体不太被一般读者所接受,遂渐渐沉寂,被他的弟子如周氏兄弟所取代了。

如果没有太炎一代对文体的探索,鲁迅那代人可能不会马上找到自己的新门径。不过,章太炎的路是奇险之旅,要有很深的国学根底才行。太炎在自定年谱上说:

初为文辞,刻意追蹑秦汉,然正得唐文意度。虽精治《通典》,以所录议礼之文为至,然未能学也。及是,知东京文学不可薄,而崔寔、仲长统尤善。既复综核名礼,乃悟三国两晋间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于是文理渐变。

章太炎对文章的敏感,有多重用意,因为是文字学大家,对词语的变化有自己的看法。另外受到了日本武岛又次郎《修辞学》影响,“见在语”“国语”“著名语”之外,对“外来语”“新造语”“废弃语”亦多关注。太炎认为,中国古代“废弃语”很多,其实可以重新采用。它们也能够转化为新式语言。

那些恢宏的雄文,采用“废弃语”为多,一面有古风,一面又多是高远的气象。这对鲁迅兄弟,是很大的影响。他们初期文章其实就是在“废弃语”中转化新句式的努力。章太炎这个思路,颠覆了旧文人的俗套,鲁迅从中有所心得也是自然的。不过,后来周氏兄弟放弃这些文体,可能与他们翻译的实践有关。从外来句式和传统中寻找新的表达,使他们走出了章太炎的路径,有了自己的家法。

但在看似不同之中,还是有相近之处。比如都自然酣畅,精神是奔放的时候居多。语言的问题,表面是表达的问题,实则是一种思想的辐射。晚清的思想革命,从哪里开始?孔子的资源似乎有点问题,外来的精神又隔,那么只有从衔接六朝精神开始。鲁迅早期翻译外国小说,就已经从文体上告别了晚清体,自寻其路。这是大炎的启示。因为属于工具层面的选择,鲁迅自己不愿深谈其间的话题,好像被思想革命遮掩了。现在我们还原起来,则可以看到更深层的问题。

章太炎在晚清,于文章上是独树一帜的。他的许多弟子,从学理上可以继承老师的传统,但在文学学的层面,却不能继续前行,是未得真传的。但周氏兄弟不是这样,他们在白话文上,拓出新路,将文章变得好看好玩,实则太炎遗风的流转。从另一个层面沿着老师的路走,可谓现代文章的变法。真得师传的,也惟有鲁迅等人。至于黄侃、钱玄同则是学理层面的延伸,深明文章流变的奥秘者,不是很多。

能够看出这一点的,是许寿裳。他晚年赞扬章太炎的时候,也真诚地推荐鲁迅。在他眼里,师徒之间有衔接的地方,都对中国文学有推动之功。从章太炎到鲁迅,文章的气象大变,中国文化的朗然之气,已经把历史的浊气驱走了。

由文章而及人,再由人到文章,人与文的统一是没有问题的。太炎的英雄气,在鲁迅看来是一种新道德的化身。这位老师的许多东西为鲁迅所接受,其中之一就有对知识阶层的态度。恰是和旧式文人斗,才有了新的道德标尺。也就与各类文人隔开,自己另行一路。鲁迅自己后来也是有几分这样的气象的。

在章太炎看来,读书人问题多多,“朴学之士多贪,理学之士多诈,文学之士多淫,至外学则包而有之。”(《革命之道德》)而儒家的“哗众取宠”则去人性的本真深远。《答铁铮》一文对知识界的众多学说提出己见,以为旧儒的思想不合实际,惟佛学可用。在儒家与墨家之间,后者亦可参照而行。所以,驱除“伪饰”之学,对知识界十分重要。鲁迅早期的思想起飞,也有些是受到老师的启示开始的。

鲁迅的《破恶声论》没有写完,但旨归明显,就是“迷信可存,伪士当去”。他看到了那时候知识界对技术的崇洋,以为走了错路。他对那些读书人的伪学问的批判,几乎也夹杂着自己的老师的声音。人不可以没有民间信仰,百姓间的纯粹的信念,是民族精神的支柱之一。如果看不到此点,则大有疑问的。

这是鲁迅批判知识界的开始,他后来与陈源战,与梁实秋战,与左联内部的文人战,都本乎诚信这一点。那些自称掌握了真理的人,多为可笑者,那原因他们的“信”,是大可疑问的。

从鲁迅的杂文和书信里可以看出,他对旧式文人是不喜欢的,对新文人中的西崽相也很反感。后来,他的文章一部分是社会批判,一部分是文人批判。与各类文人都有对话,是有锐气的。笔锋也含着章太炎的峻急,毫不留情,甚至苛刻。他对读书人的积习,多不欣赏。比如像钱玄同的唠叨、表现欲强,就很反感。至于刘半农的教授腔,就更为滑稽,落入士大夫的途径了。他一生和留学欧美的学生,关系多不好,有的甚至交恶甚深。比如对胡适的批评,就很激烈,那原因是其与政府关系暧昧,有深的问题。胡适也是新式文人,思想也不迂腐,自由和科学的精神高举着,非常人可以比肩。鲁迅刺其观点,乃觉离生民甚远,跑到庙堂里去了,以鲁迅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放逐自己到荒原里的,不必顾及利害。1927年,在上海的一次演讲时,他给知识阶级下的定义是:

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

许多读书人今天一个看法,明天一个观点的人。鲁迅后来诟病其文章,大概觉得与流行的东西太近,遂不见鲜活的力量。他的加入左联,其实就希望出现一个新的知识阶级,译介俄苏的作品,也是有自己的寻梦的渴望的。

鲁迅一生也错过过很多人,评价同时代的人也有失察的时候。比如对张定璜、高长虹的前后不一的感受都是。这都不影响他的个性的魅力。从晚清开始,知识界一直在作,保皇派与革命派斗,三民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斗,左翼作家与自由文人斗,从未消失去。这里,鲁迅是个个案,他几乎与所有的文人团体都有摩擦,有时候不得不横战,与周围的世界周旋。这种紧张在晚年越来越严峻,以致对许多问题的判断,不是从学理上思之,而是以战士的姿态为之,看人看事就有了不同的视角。他晚年悼念自己的老师章太炎,不去评价其学问,置其遗产的大部而不顾,仅说其革命的意义,乃自己也是斗士的缘故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一个生命,诞生130周年,这是个什么概念?往小看,一个活了56岁的人,他得由生至死再活过两轮之后,又开始第三生,在这第三生上,他又长到了18岁。往大看,可以从1840年到1970年,是中国(只是就中国而言)经历了鸦片战争及其之类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京、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军阀混战、国共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再战争、1949之后的17年时代、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何以在这样漫漫的岁月间、这样浩荡的历史时空中,老是唠叨某一个人呢?几乎脱口而出的是:这究竟是后代人太乏、太不行了,还是——130年的酷虐不仁成功地阻挡住了文化创造、生命前行的脚步?

这无解的问题姑且不说它。可说的是,在生命的路上,那个叫鲁迅的人,究竟抵达过何种深处、怎样高度?不只一个人说他虚无主义,也不只一个人坚信他才是“深山中苦修的老僧”,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我亦有此种坚信。鲁迅本人所深受影响的哲学家尼采是这样说的:积极的虚无主义是人之精神高扬上升的标志,消极的虚无主义才是生命由此沉沦的地基。在我看来,鲁迅与虚无的关系,是我们这个民族自有历史以来最具积极意义的一个范例。或者,真会囿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进程的艰难,这个范例对于未来的影响,我眼下看不出它何时会被新的同样深刻、同样勇武、同样仁爱的生命体验所证明、乃至所逾越,倒是,今日的世界大有一种离他越来越遥远的严正架势。

“虚无”,这据说是自有人与哲学以来最深刻,也是最令人痛苦的生存体验之一,它是为鲁迅所疾声直面过的:“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我至少将得到虚无”。但不要弄错了,倘若他只是走到这里,那不过是在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众多败笔上再添一抹——不,他搏击了:“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他是迎击虚无、毅然上路的“过客”;他悍然抵达过生存的至深处“扶心自食,欲知本味”;他断然出世的生命创造之路:“要有这样的战士”,“他”“走进无物之阵”;他置身暗夜的惊人自觉则是“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

他分明是成就了——漫漫人生里严正的生命信仰的,由“虚无”而至“信仰”,这心迹清晰可见,但何以——别样的人们至今看不到的呢。我纳闷了:灵魂与灵魂的隔离;而这,却也正是鲁迅曾经说及的人间无奈之一。他所预料的,似乎总是比我所臆想的要多。

无需记忆的还在乎,正是鲁迅,不仅把搏击虚无的心迹点亮在自我生存的幽深深处,更把充实虚无的路径奠基在人间苦难、社会黑暗的改变之中:执意“愿世界为(她)变好”,所以,“叛逆的猛士”,“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叠积的凝血”,这正是《野草》之后大写关怀人间、针砭时世、辛辣批判之杂文的“战士鲁迅”的精义吧——我以为。

(作者系汕头大学教授)



孩子，真的解放了吗？

最近，网上热议的五道杠少年黄博的事件，不禁使我想起了一百多年前鲁迅的那句名言——“救救孩子”。

当年的鲁迅，深感受疗救愚弱的国民，首在“立人”，而所立之人，首先就是孩子，所以在作品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认为只有把他们培养成具有健康的体魄、健全的精神，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才能在广阔的世界中不被时代潮流所淹没。如今，我们的孩子真的被解放了，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了吗？

家庭内，由于独生子女的缘故，从一出生，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六双眼睛就注视着这个孩子，所有的希望都寄予其一身。在这聚光灯下长大的孩子，我无法想象，他们在精神上会真的感到自由。作为文豪的鲁迅，从没有要求自己的孩子每天要认识几个字，每天要背几篇课文，他深知那是对孩子的一种摧残。他更没有要求自己的孩子像他一样成为文学家，而是希望他按照自己的心愿，寻一点小事情过活，所以他的独子能够学习自己喜欢的无线电技术、摄影，这该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快乐啊！而我们的孩子呢？除了学校里的功课，还要完成家长布置的作业，好不容易等来了双休日，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兴趣班又等在那里了，连个喘息的机会也没有，而家长还美其名曰：“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浑然不知游戏、玩耍乃是孩子最正当的行为。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每一位家长还是必须学学“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社会上，成人世界中的一些细菌同样在侵害着孩子们。比如各种各样现代传媒工具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而孩子们对此是没有辨别能力的。同样，作为精神食粮的书籍也未能逃脱被污染的命运，鲁迅的时代，他是有感于孩子们精神食物的匮乏，而千方百计地将国外的优秀儿童读物翻译过来，《地底旅行》《月界旅行》，这些科幻童话给孩子们带来了多么新奇的思想空间。而现在的很多读物，在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背后，不正是利益的驱动吗？鲁迅也曾批评过那些“成人的缩小”、“儿童的大人化”现象，但可悲的是，直到21世纪的现在，这种情况依然存在。成人化的言行从幼儿的口中、行动中出現，还引得旁人的称赞，而小儿在成人的笑声中益发高兴。家长也以为是给自己增了光而扬扬自得，殊不知这与现时食物中加激素有何区别？失去了童真的孩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孩子！

鲁迅曾说过，希望他的作品速朽，但我们不得不感叹，他的思想太深邃了，他的目光看得太远了，正如郁达夫所说的，“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于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他当年看到的问题，在今天的孩子们身上依然存在，所以，他的作品还无法速朽，孩子们离真正解放的路还很长……

(作者系绍兴鲁迅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纪念作为文人的鲁迅

□李林荣

的个人才具或者社会资源。鲁迅28岁到46岁18年从教从政的经历，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以往至今，学术界和舆论界一直有人饶有兴致地穷究鲁迅是否凭借了“某籍某系”的人脉背景，走了蔡元培的后门，先得了教育部的职位，后又兼了北大的教职，隔些年还领取了“中研院”的特别撰述费。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不愿在苛责鲁迅的同时，也一并贸然否认蔡元培身为鲁迅前辈乡贤和一位伟大教育家的识人之明、知人之深、容人之广，那么，鲁迅从蔡元培那里得到的这些恩待，何尝又不能看成是鲁迅的才具和人格，逢着怎样的公平合理机遇时，所赢得的一种正当合度的认可呢？

而历史更冷酷、更常有的的一面，则是蔡元培式的温暖，播洒到鲁迅这里，如灵光乍现般可遇而不可求。此前、此后的更长行程和更多时候，为保持自己“时时更新”的精神生机和战斗力，鲁迅必须做出“扶心自食”的决断和牺牲，首先就是要剔除随波逐流的庸常生活方式。比照一下与鲁迅同样成名于“文学革命”中的其他那些文人，在跨入社会、政治和文化全面两极化的1930年代时，在个人社会生存方式上避重就轻甚至自我背叛的选择，就不难知道，当鲁迅选择了无业居家的“自由写作”生活时，事实上，他已经从生存基础上，把自己从现实社会的土壤里连根拔起，拒绝了跟现实中的一切魑魅魍魉妥协协商和的可能，执意迈进了“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的苦斗、血战的孤绝境地。

在这境地中，他全部的劳作，都集中在了貌似从文人生活的古老传统中延续下来的笔墨事业之上。表面看来，这时的他，仿佛回归到了自己生命开初那段终日不离笔墨纸砚的早年岁月。然而实质上，他这一时期的写作、翻译和编辑，已全面、彻底地漫出了不止能够流行在某一个时代里的那些纯文学范畴和纯文人生活的边界，奔涌冲击到了确实只有用“思想家”和“革命家”的称谓才能勉强指涉、涵盖的深广领域。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后人纪念鲁迅，永远需要以阅读他留下的所有著译文字为前提，但伴随这种阅读的理解、认识和评价，又绝不能仅仅是在溜光水滑而又僵化狭隘的所谓纯文学的框架内和尺度下展开。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

纪念一个历史人物，最好也最切实的方法，是缅怀他的生平行迹，从他有稽可查的一切所作所为中，追寻某些可资当代镜鉴的经验和启益。对鲁迅尤其如此。这不仅因为在鲁迅生前身后，人们谈论和评价他的话语实在已经太密集，以致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他本人的言行作为，而且也因为他的人生历程，相比于附着其上的种种性质不同的繁复修辞和厚重期许，都显得过于短促和简明。

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卒于1936年10月19日，传统的算法是享年56岁，实足在世时间55年。这55年，依实际生活状态的逐步变迁，可分为四阶段。

最初一阶段（1881—1898），历时17年，特点是人不离家。前11年基本全天候在家，其中，7年童蒙闲居，4年在家塾随族亲长辈开蒙识字；后6年，每天往返不过一里路，走读三味书屋，接受通往科举应试道路的较正式的社会教育。

第二阶段（1898—1909），历时11年，特点是远走他乡、在外独立求学。前4年，先后在南京就读江南水师学堂和陆师附属矿路学堂；后7年在日本，头二年在东京弘文学院习语言关，后二年赴仙台学医，其余3年，在东京游学，自行从事译、著，致力文艺活动。

第三阶段（1909—1927），历时18年，特点是谋职于教育界。前3年当教员，先在杭州两级师范，后在绍兴中学堂及山会师范学堂；后14年在国家教育部任公务员，最初两月在南京，后迁任北京，在北京期间，公余断续兼任多所大学、中学教职；最后一年专职当教员，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

第四阶段（1927—1936），历时9年，特点是无业在家、自行写作、翻译，筹划编辑报刊书籍，参与左联等文学、文化团体活动。

从“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总体评价的高度上，俯瞰纵览上述这四个阶段，不少人可能会觉得，鲁迅这55年的生平全程，至少在外在形式层面，未免缺乏了一点高级而上、步步登高的传奇色彩，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有多少倒啃甘蔗、甜头在后的喜悦和乐趣。但依历史情境的本相而论，像鲁迅这样，只有遥遥隔着漫长的时光隧道，并且是距离越远而越能见其伟大的人物，在他存世的时候，要坚守自己瞩望长远的志向和事业，除去承受着不惜处境寒微、艰危重重的代价，义无反顾、正道直行，的确也没有旁逸斜出的捷径或两面通融的弯路可走。

换句话说，他本并不缺少可以拿出来从自己现实际遇中换取名位利禄